

沾墨的手指

几百年来,人文主义者一直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:他们痴迷书本,以至于不事生产、四体不勤。但最近一本名为《沾墨的手指:欧洲现代早期书本的制作》的书,邀请读者将欧洲现代早期的学者视作勤奋的工人:阅读时他挥舞着沾墨的笔,孜孜不倦地摘录笔记,写作时他将这些笔记重新组合在一起,之后更是要花费大量精力,和包括排字工人在内的出版行业各个流程的人员打交道……总而言之,当时的出书过程充满了体力劳动,而这样的过程,也塑造了那些影响巨大的书籍、文章和伪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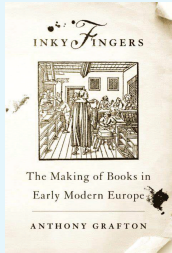
《沾墨的手指》作者是著名的思想史学者安东尼·格拉夫顿,他的《脚注趣史》《时间图谱:历史年表的历史》等书皆有中译。在格拉夫顿看来,思想的生命取决于手的工作,书籍制作的这一本质对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当时,阅读和写作首先意味着要弄脏你的手。比如斯宾诺莎为了了解希伯来语圣经的文本,不得不在信息量巨大的手稿中爬梳,查引前人书中引用的更早文字,糅合这些信息,才写成他那篇辩才十足的《神学政治论》,在欧洲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。

在斯宾诺莎那个时代,写作要遵循一套繁琐的程序。首先是大量的阅读,在前人著作中划线并注解、做笔记,而这些看似单调的做笔记过程,却能极大地刺激智力。之后,作家们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将这些笔记融会贯通。在现代早期世界中,许多最令人难忘的金句——比如哈梅雷特的“生存还是毁灭”讲话——都是由别人说过的陈词滥调拼凑而来,但自然是经过成熟的思考和风格炼金术的改造。

再以1620年代开始印刷的莎士比亚剧本《第一对开本》为例,它为莎士比亚大约20部剧本提供了仅有的可靠来源,影响自不必说。现代学者确认,其中文字由五位排字工人排版,他们的拼写习惯和业务能力各不相同。有时排字计算失当,便需要扩展或压缩文字,一行诗可能被印成两行,或者诗被印成散文格式来节约空间,一些行和小节甚至被省略。带来最多麻烦的是编号为E的那位排字工人,他应当是名学徒,明显不太会处理手稿,这些都给后世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。

如今的出版之路,相比从前是舒坦很多,至少技术上如此:学者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文档,用Zotero做笔记,在Word中写作,最后将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期刊或出版社。正如从事键盘工作的现代人担心腕管综合征(鼠标手),早期的现代学者因为无休止地阅读小字体而令眼睛疲惫不堪,多年来他们蜷缩在摆满书籍的桌子上,手指因关节炎而弯曲,墨迹斑斑。

(编译/席庸)



“辛学嘉”对峙“温建白”

《菩萨谭》与 1910 年代的“文明”争持

沈洁

《菩萨谭》是1913年连载于《小说月报》(第4卷第7、8号)上一则以反迷信为主题的中篇小说,全书共十回,通过江南某县县议会关于反迷信问题的讨论及主人公游历县境,对废毁庙宇等事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,描述了20世纪初年中国在启蒙与社会革新上的种种芜杂。

作者“苍园”,此署名在近代小说史上,有“偃源苍园”、“项苍园”两位常见作者,长期以来,被认为是艳情小说家、《九尾龟》作者张春帆。但最近才有学者考订清楚,此处“苍园”另有其人,是安徽太平人项翱(1876—),字渠川,光绪甲辰(1904)前后游幕通州,追随张謇开办实业,进入南通师范学校,并担任过南通艺徒学校校长。宣统元年(1909)归乡任太平县高小校长,创办觉民初级小学校等。著有迷信小说《菩萨谭》、军事小说《骊游记》以及《铜驼泪史》《柁机鉴》《模范村》《扬州梦》《家庭现形记》《虎父犬子》《黄金帚》等十余部长短篇小说(谢仁敏:《“项苍园”非张春帆考》,《文学遗产》2010年第3期)。

由这份简历,我们能看到项翱身上鲜明的“维新”特征,不仅习新学,还有相关实践,这正构成《菩萨谭》在晚清民初众多社会小说中的特殊性——不在批判风俗,而在探讨改造者的行动困境。它的写作年代为1913年,民国肇兴,改良风俗、破除迷信从启蒙进入实践场。如果说《扫迷帚》《瞎骗奇闻》等清末“迷信小说”可称为“迷信风俗志”,论者谈论迷信如何为“阻碍中国进化之大害”属启蒙序列;《菩萨谭》则在描摹国家力量进入社会场域,废毁行动遭遇的实际阻滞。这个区分,便是清、民鼎革带来的,启蒙由“表达”变为“实践”的转折。以理念改造思想、掀动社会,过程必然伴随警虑、敌对、抵挡和翻覆。这篇小说讨论的,正是这个过程。

破除迷信是“民国”之于推倒“封建王朝”在思想、政治、社会等众多意义上的国策指向,县城、乡间却因菩萨被毁“闹得不可开交”。小说以当地督军下令封庵堂、废庙宇引发的乡民争执作为开端,表达主线的,则是第二回“辛学嘉赞成急进,温建白力主平和”篇目,县议会开会讨论破迷问题时各路绅董的辩论与争端。两位主人公,辛学嘉和温建白,谐音取名,一目了然透

露了作者将激进主义与缓进主张置于对立两端的隐喻意味。

会首由一位“手上拿着一顶瓜皮帽子”的老先生担任,他首先发言:

把菩萨毁掉,改为公益的处所,这件事倒是一件好事,但是很不容易办得妥善,第一件怕乡下人闹事,第二件怕兵士们借端骚扰,第三件怕和尚们无处谋生,第四件怕各处争产闹风潮。这种种的后患都是不能不防备的。

这番持论中和的开场白,提供了几个方面的基本线索:“民国世界,讲究文明”,破迷是不需辩解的时代主题,接续关键在于,怎样抵达、用什么具体方式;激进主张者如何处理因之引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动及其“后患”;缓进主张者也必须首先厘清“迷信”的概念,其范畴、内涵与外延。

开场者话音未落,会中一位年约二十来岁,“穿的是一身洋装,戴着一副金丝眼镜”的年轻人辛学嘉便“气昂昂”登场了——“天下事总要从根本上解决!”迷信导致民众废财失业、产生倚赖性质,自传统中国废毁淫祀到现代中国破除迷信,是一以贯之的叙事逻辑;不同的是,民国“新学家”眼中,世界剩下“迷信”与“文明”的二分;破迷应当像革命一样,“手段要放辣些,心肝要放狠些”。他所认定的,是一个必须全面、根本、彻底废毁信仰的时代。这不仅意味着“现代”,更意味着“激进现代”,切断与旧世界的一切来路,重置时间。

“狠”“辣”主张立即引来反对派:“你老哥这番话是一种急进主义,我温建白是绝对不敢赞成的。”

“好”与“坏”温建白认为,迷信固然当破,但必须鉴别“好的迷信”与“坏的迷信”。“常言道,‘三个知县不如一个城隍’”,当代政治改良家随口道出新名词,却不曾考虑“迷信”与百姓生计及其应对生活困境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。温建白声称自己对迷信“实在是崇拜得很”:一个人如果没有迷信就一定没有心性,没有心性就没有团体,没有团体就没有国家,也就没有世界,“古今来那些大忠大孝大节烈的人,哪个不带着三分痴气呢?”“痴气”便是“迷信”,神仙鬼怪即为民众听得懂的政治与律法,构成一种国民道德的维系力量。

“拣弱的欺”民国约法,大

总统令也明令保护宗教财产,却“独独把那些没有势力不挂洋旗的菩萨毁掉,岂不是拣弱的欺吗?”——道出了破迷运动的精英立场。“现代”对信仰问题存在明确层次区分,但立场各异的“新学家”却很一致“拣弱的欺”。毁菩萨问题透露了历史的诡刺:一方面,这个现代化的政府不遗余力向民众标榜“什么叫做博爱,何谓自由,何谓人道”;另一方面,却又以实际行动削夺着上述现代理想。温建白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抓住了症结所在——文明与进步是动人的名义,但文明世界并不在意民间受到了无穷的影响,这代表了精英文化对下层文化的俯视及单向度改造方式。

“不能速效”温建白说,霸术虽可速效,究竟不如王道可以持平;民智未开,则不能完全依赖现代法律制度。他讥讽那些整日将“开通”二字挂在嘴边的“上等社会”,总是巴不得一朝成功,却只是“口头禅”罢了。对被迫接受改造的“下等社会”,不开通就总是过于闭塞;因为闭塞,又相当顽固。“开通者”与“不开通者”各执一词,两相隔绝,简直缠成一个死结。

晚清民初的启蒙思潮,自理念变为行动,因国家力量介入,便很容易演变为政治宣传及权力的横暴。《菩萨谭》这篇小说揭示的,就是激进主义者与缓进持论者、现代与前现代、民众与知识精英之间持续的争执与回响。

小说最后,作者又借一位名叫“冷眼旁观”的论者,道出对这场激进与缓进辩论的困惑:破除迷信是“开通者”对于“不开通者”的改造;但“为什么那些开通的人,越开通越讲迷信,他嘴里说得菩萨没用,然而他时常敬的是财神,他奶奶敬的是送子观音。这等人都是教育旁人的,你又当如何教育他呢?”温建白听罢,亦觉不能自圆其说,只好付之一笑。作者本人亦在煞尾处,一番自嘲:“我们中国的人大概多是劝世文贴在背上,有嘴说旁人,无嘴说自己,这个毛病在下亦未能免此”。究意是彻底作个了结,还是自然而然、循序渐进?“迷信”的“开通者”又当怎样去教导那些同样“迷信”的“不开通者”?小说没有给出答案。

《菩萨谭》虽为小说家言,但它反映的却是鼎革之际“涤荡旧染污俗”过程中的人心和世相,

这种人心和世相充满了内在紧张。思想史上的任一主题都由具体语境生发而来,“辛学嘉”和“温建白”潜藏或折射的是论者对时代主题的疑虑。改造民间俗信、开通民智固然构成历史终结式的目标一致,但不同社会团体在对待何为迷信、破迷的实施步骤以及实施手段上,却分歧很大。进而可以申论的是,他们对何为“现代”、如何实现“现代”也存在明确差异。清末民初有关富强、有关未来的那些想象,具有的是一种表象性的目标同一,一种抽象的时间价值,因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,不同启蒙团体之间也就缺乏历史的、逻辑的联系。这个脱嵌,便以林林总总的方式体现于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无序和矛盾中,构成时代的历史特征。

基思·托马斯在《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》中讲信仰可以提供一种愿景,构成一种系统的解释、一种道德律法的资源、一种社会秩序的象征或是一条通往不朽的道路。小说家展衍的正是对这一文化自觉的生活化感知,“菩萨”为民众提供国家、律法不及之境。从这篇并不高明、充满了说教意味的小说,我读到了一个多世纪之前人们关于“现代”与“文明”的争持。这不是坚定的、“执拗的低音”,而是进步、热烈时代情绪中一些趑趄和困惑。我看到时人对于中国必然走向现代的乐观,也看到他们对“从根本上解决”的质疑,对“开通”“新学”“文明”的调侃。

后现代、后结构研究中,透过国家对民间社会经由纪律、惩罚和规训来探讨现代的压制性影响及其权力扩张,已然是我们熟知的学理脉络。百多年前的人,当然没有深刻到确切判定作为权力的科学、单一维度的科学对世界意味着什么;但他们对于民众需要什么,对于以“文明”的名义压倒一切的做法却有清醒认知。“所有发生过的事物,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”——反思现代性不是“后学”发明。鲁迅在1908年就高呼过“伪士当去,迷信可存”,自“现代”开始的时刻,不仅有“弱者的反抗”,也始终伴随改造者对合法性与行动方式的自我批判。发掘这些“质疑”及“困惑”之声,也可使我们更复杂地审视20世纪初年轰烈的社会运动,至少在思想史意义上,居上位者在设法探索如何减少争端与苦痛,思考真正有利于民众世界的方式。小说憧憬的好世界好社会,向往政治的正大,描摹人世的复杂脆弱,在翻阅者的眼中穿越1910年代的地覆天翻,抵达未来。

(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)

